

東晉門閥政治

田餘慶 著

自序

《東晉門閥政治》一書，論述從公元 4 世紀初至 5 世紀初的百餘年間，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權結合而運轉的政治歷史。東晉門閥士族的興替和門閥政治的發展以至消亡，從本書首尾相銜的各題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內在的關係。

本書前七題，依次論述各家士族當政時期的歷史，藉以顯示東晉門閥政治的階段性。為了弄清某些比較隱晦的歷史內容，作了較多的考證。《後論》之作，一方面是想把前面各題的論述加以貫通，以明本書脈絡所在；另一方面是想對作為本書主旨的東晉門閥政治的內涵外延，試作補充說明。

門閥政治，中國學者見仁見智，原無一致的理解。國外著作也頗有異說，多數人接受貴族政治的解釋而對具體問題各有主張。有的學者釋之為寡頭政治。這種種解釋無疑包含了許多精闢之見。只是，學者們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史研究影響，無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視中國古代久已形成皇權政治傳統這一歷史背景。而且，中外學者多是概括江左五朝、江左六朝，甚至整個魏晉南北朝歷史而籠統地談門閥政治，也就是說，他們傾向於認為門閥政治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之久，而較少從發展中考察門閥政治。

本書所指門閥政治，質言之，是指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它來自皇權政治，又逐步回歸於皇權政治。本書定名為《東晉門閥政治》，原意並不是截取歷史上門閥政治的一個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來，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前此的孫吳不是，後此的南朝也不是；至於北方，並沒有出現過門閥政治。門閥士族存在並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歷史時期，並不都是門閥政治時期。這是本書的核心思想，也是本書《後論》企圖着重說明的問題。

本書偏重於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不是全面的東晉政治史；它以江左幾家僑姓士族的興衰為線索進行考察，但也不同於各個士族門戶的個案研究。書中旁及軍事、地理、文化、經濟諸問題，只限於闡明門閥政治的需要，一般不作詳盡論述，以免駢枝之累。

文稿寫成後陸續請北京大學歷史系周一良教授、祝總斌教授看過，在材料和論點上都得到他們精心指正，謹此致謝。

本書有參考未備、論斷不當、史料失誤以及其他不妥之處，統祈讀者賜正。

作者

1986年1月於北京

目 錄

釋「王與馬共天下」	1
一 西晉諸王與王國士人	3
二 司馬越與王衍	9
三 司馬睿與王導 門閥政治格局的形成	19
四 關於「不與劉、石通使」問題	29
論郗鑒——兼論京口重鎮的形成	41
一 小引	43
二 郗鑒的密謀	46
(一) 東晉初年的兵力狀況	46
(二) 流民與流民帥	49
(三) 用流民帥平王敦之亂	55
三 郗鑒與王導	58
(一) 郗、王家族的結合	58
(二) 蘇峻亂平後的江州	66
(三) 郗鑒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68
四 郗鑒與京口經營	76
(一) 三吳的戰略地位	76

(二) 會稽 —— 三吳的腹心	81
(三) 建康、會稽間的交通線	85
(四) 京口和晉陵地區的環境與流民	92
(五) 京口在政治、軍事上的作用	95
(六) 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響	99
五 餘論	104
 庾氏之興和庾、王江州之爭	109
一 庾氏之興 庾亮鞏固門閥政治	111
二 庾亮出都以後的政治形勢	118
三 庾、王江州之爭	123
四 襄陽的經略	135
 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北伐問題	145
一 桓溫先世的推測	147
(一) 桓溫先世的隱情	147
(二) 桓溫是桓範後裔	148
(三) 桓範的郡望問題	154
(四) 旁證	157
(五) 小結	160
二 桓彝事跡雜考	162
(一) 中朝桓彝無令譽	162
(二) 桓彝過江後躋身「八達」而又志在立功	164
(三) 桓彝族單勢孤	167
(四) 桓氏家族不為時人所重	170
(五) 小結	172

三	永和政局與永和人物	174
四	桓溫北伐與東晉政爭	184
五	簡文帝遺詔問題	192
 陳郡謝氏與淝水之戰		205
一	謝鯤、謝尚與謝安	207
二	北府兵	220
三	淝水之戰前後的陳郡謝氏	226
四	淝水之戰與滅吳之戰的比較	237
五	北方民族關係與淝水之戰性質問題	247
 門閥政治的終場與太原王氏		263
一	小引	265
二	「鯨王」世家	266
三	孝武帝與皇權政治	273
四	主相相持與太原王氏	280
	（一）主相相持的開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	281
	（二）上下游的爭奪——王忱與王恭 （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	284
	（三）殷仲堪入荊與孝武帝得勢 （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396）	286
	（四）孝武帝死後王恭、殷仲堪連兵叛亂——兩藩與中樞之爭 （太元二十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	288
	（五）太原王氏的覆滅（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	291
五	小結	293

劉裕與孫恩 —— 門閥政治的「掘墓人」	299
一 晉末的北府兵	301
二 北府將樂安高氏	310
三 道術與政治	316
四 孫恩、盧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323
五 孫恩、劉裕與次等士族	331
後 論	339
一 舊族門戶和新出門戶	341
二 東晉僑姓門閥士族的主要來源	346
三 門閥政治 —— 皇權政治的變態	351
四 門閥政治和流民	357
五 門閥士族的經濟基礎	360
六 門閥士族的文化面貌	364
七 門閥政治的暫時性和過渡性	369
改版題記	373

釋「王與馬共天下」



一 西晉諸王與王國士人

《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1]

《南史》卷二一史臣論曰：「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琅邪王氏諸兄弟與晉琅邪王司馬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密切關係。王導以他所居司馬睿左右的關鍵地位，艱苦經營，始奠定東晉皇業和琅邪王氏家業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語。王與馬的結合，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東晉初年諸帝，待王導以殊禮，不敢以臣僚視之。《世說新語·寵禮》：「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元帝）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2]元帝對王導，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給王導手詔，用「惶恐言」、「頓首」、「敬白」；中書作詔則用「敬問」。成帝幸王導宅，拜導妻；王導元正上殿，帝為之興^[3]。

[1] 《通鑑》太興三年（320）錄「王與馬共天下」之語，謂其時「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佈列顯要」云云，得實。「王與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敦所起的實際作用不比王導小。本文從中樞政局着眼，只論王導。

[2]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略同，「元帝正會」作「帝登尊號」，無「中宗引之彌苦」句。

[3] 分見《晉書》卷六五王導、卷三九荀奕、卷七八孔坦等傳，卷一二《天文志》以及《太平御覽》卷三九五引《晉中興書》。參看《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敬司徒王導下（不）》條。

「王與馬共天下」，這並不是時人誇張之詞，而是一種確有實際內容的政治局面。《晉書》卷六《元帝紀》，永昌元年（322）王敦兵入石頭，元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同書卷九八《王敦傳》記元帝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時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圖維持與王氏的共安。他請求王敦不要擅行廢立之事，不要破壞「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執意獨吞天下，破壞共安，元帝無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國邸這一條路可走。

徵之歷史，「共天下」之語，古已有之，並不始於兩晉之際的王與馬。《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不韋為子楚謀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子楚允諾呂不韋共有秦國，這就是後來子楚得立為莊襄王，並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的緣由。《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漢五年劉邦擊楚，諸侯約而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韓〕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漢書》卷一《高祖紀》記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師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這就是劉邦發使割陳以東傅海之地與韓信，割睢陽以北至穀城之地與彭越的緣由。

由於時代的推移變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況，西漢以後已經不存在了。「王與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關係，而是指在權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與一般君臣不同的關係。王與馬的這種名器相予、御床與共的關係，發生在東晉創業、元帝壯年繼嗣之時，不是末世權寵禮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類不正常的情況。

王導以一代名相處此而當世多不以為非分，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¹⁾。

為甚麼江左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面呢？總的說來，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則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士族高門與晉元帝「共天下」，歸根到底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但是這還不能說明為甚麼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別的高門士族與晉元帝「共天下」的問題。晉元帝與琅邪王氏之間，尚有其歷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結，因而形成王與馬的特殊關係。

西晉諸王，或隨例於太康初年就國，在其封國內有一段較長的活動時間；或雖未就國，但與封國有較多的聯繫。他們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的士人結交，甚至姻婭相連，主臣相託⁽²⁾，形成比較密切的個人和家族關係。東漢守、相例辟屬內士人為掾，此風在西晉時猶有遺留。西晉諸王辟王國人為官之事，史籍所載不乏其例。《華陽國志·後賢志》：常騫，蜀郡江原人，「以選為國王侍郎，出為綿竹令，國王⁽³⁾歸之，復入為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

(1) 明于慎行《谷山筆塵》卷四《相鑑》謂「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矣。」于氏蓋就北周太宰宇文護故事立論如此，並謂至宇文護，「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護）名，甚於贊拜不名矣。……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于氏所論不及東晉王導事，似欠周全。

(2) 諸王與王國官有君臣名分，至劉宋時始有詔禁止。《宋書》卷六一《江夏王義恭傳》載，孝武帝欲削弱王侯，諷有司就江夏王義恭及竟陵王誕希旨所陳九事增廣為二十四事，其一為「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詔可其奏。按，州郡長吏與掾屬間有君臣名分，東漢已是如此，諸王與王國官屬有君臣名分，更不待言。

(3) 按前一「國王」疑當作「王國」，後一「國王」疑當作「國人」。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年），於前一「國王」亦謂「當作王國」，於後一「國王」則未出校語。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9頁注②則說：「『國王侍郎』，謂在鄴之王府官；『出為綿竹令』，自鄴出也。『國人歸之』，穎復召還之也。」此說似嫌牽強。

太守，加材官將軍……」。按同書《大同志》太康八年（287）^{〔1〕}成都王穎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內。由此至永寧、太安年間，蜀亂，成都王穎徙封荊州南郡四縣（《晉書》卷一五《地理志》）為止，歷時十餘年之久。所以司馬穎與成都王國士人關係甚多，是可能的。《晉書》卷九〇《良吏·杜軫傳》，成都人杜軫，子毗，「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軫弟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皆屬此例。《世說新語·賢媛》注引《晉諸公贊》：孫秀，「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孫秀於趙王倫篡位後為中書令，政皆決之。《世說新語·仇隙》注引王隱《晉書》以及今本《晉書》卷五九《趙王倫傳》皆著其事跡，更是顯例。《晉書》卷五四《陸機傳》、《陸雲傳》，機、雲兄弟，吳郡人，吳王晏出鎮淮南，先後辟機、雲兄弟為王國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陽葛洪，父為吳王晏郎中令，而丹陽亦吳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國辟屬內士人之例。依成都國、琅邪國、趙國、吳國諸例推之，司馬睿一系之琅邪王與琅邪國內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較牢固的歷史關係，是當然之事。

諸王所辟或所與交遊的王國士人，如果出於國內著姓士族，其關係可能更為不同。司馬睿之祖司馬卬於西晉平吳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時琅邪國內最顯門第，當數臨沂王氏。據《晉書》卷三三《王祥傳》，琅邪臨沂王祥於曹魏黃初年間為徐州別駕，討破利城兵變，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北堂書鈔》卷七三引王隱《晉書》，謂王祥「以州之股肱，糾合義眾」，可證王祥有宗族鄉黨勢力可資憑藉。自此以後，王祥位望日隆，歷居魏、

〔1〕 據《晉書》卷三《武帝紀》，成都王穎始受封在太康十年，同書卷五九穎本傳，謂太康末受封邑。

晉三公之職，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輩出。像琅邪王氏那樣業已顯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舉以光門戶；而琅邪王欲善接國人以廣聲譽，卻特別要與琅邪王氏結交。司馬卣（死於太康四年，283）、司馬覲（死於太熙元年，290）以及司馬睿三代相繼為琅邪王，與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歷數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與晉元帝司馬睿在述及王、馬關係時，總說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誼。例如王導與晉元帝「契同友執」^[1]，「有布衣之好」^[2]；晉元帝曾對王敦說：「吾與卿及茂弘（王導）當管鮑之交」^[3]；王廙是晉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說：元帝與他「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4]。除王氏以外，琅邪國內其他士族如諸葛氏、顏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馬睿亦廣為結交，以盡其用。當司馬睿過江為鎮東將軍時，《晉書》卷七七《諸葛恢傳》謂：「於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用一國之才。」^[5]「一國」，琅邪國也。

王、馬關係固然有個人情誼為紐帶，但又不僅如此，它更是一種以家族集團利益為基礎，長期發展起來的相互為用的政治關係。如果家族集團利益發生矛盾，個人情誼一般就不起甚麼作用了。所以當西京覆沒，元帝將立時，王敦居然「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6]；明帝初立時，「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

[1]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

[2] 《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

[3] 《晉書》卷九八《王敦傳》。

[4] 《晉書》卷七六《王廙傳》。

[5] 按諸葛恢為琅邪陽都人，顏含及劉超均琅邪臨沂人。《北齊書》卷四五《文苑·顏之推傳》載《觀我生賦》：「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原注：「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這也可證諸王與王國士人的密切關係。

[6]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

焉」^[1]。元帝憚王氏家族太強，也圖用親信以抑王氏。當王氏家族極力抗拒此舉，甚至王敦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時，以恭謹見稱的王導實際上也站在王敦一邊。所以「共天下」云云，並不是王與馬平衡的穩定的結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出現，又依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政治現象。當王氏家族認為有必要又有可能廢立或自代時，「王與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會有破裂的可能。當王氏家族的權勢盛極而衰時，別的家庭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於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陳亮有感於晉宋偏安，如出一轍，山河破碎，弔古傷今，在所作《念奴嬌·登多景樓》一闕中發問慨歎：「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門閥政治，也就是「門戶私計」的政治，嚴格說來，只限於東晉，孫吳時還沒有，南朝時又成過去，「六朝」云云，是陳亮誤解之詞。而東晉一朝的門閥政治，則是貫徹始終，發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氏「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詮釋兩晉之際的王、馬關係，探索其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是理解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的重要一步。

[1] 《晉書》卷六《明帝紀》，未著年月。按《世說新語·方正》「王敦既下」條及注引劉謙之《晉紀》以及《太平御覽》卷四一八引《晉中興書》均載此事。《御覽》所載溫嶠反對王敦之謀，有「當今諒暗之際」語，可知事在元帝已死、明帝初立之時。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有考。

二 司馬越與王衍

「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與琅邪王氏的地域結合，又有其歷史原因。王馬結合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西晉八王之亂後期即東海王司馬越與成都王司馬穎對峙期間司馬越與王衍的關係。

八王之亂後期，惠帝子孫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為其時司馬皇統中血統最近的親屬。成都王穎搶得了皇位繼承權，稱皇太弟，居鄴城遙制洛陽朝政。東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後參與亂事的藩王。按血統關係說，東海王越是司馬懿弟東武城侯司馬廋之孫，高密王司馬泰之子，於武帝、惠帝皇統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穎居於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樣。按食邑數量說，成都王本食四郡，東海王只食六縣，大小輕重迥不相同。永興元年（304）七月蕩陰戰後，惠帝被劫入鄴，成都王穎更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黨於東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發兵攻鄴，成都王穎和惠帝以及皇室其他近屬逃奔洛陽，被河間王顥部將裹脅入關。這時候，惠帝兄弟輩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穎（原來的皇太弟，入關後被廢）、豫章王熾（入關後新立的皇太弟，後來的晉懷帝）和吳王晏（後來的晉愍帝司馬鄴之父）^{〔1〕}。惠帝和宗室近屬悉數入關，廣大關東地區沒有強藩控制，這是東海王越填補空缺、擴充勢力的大好時機。東海王越的勢力就是趁這個機會擴充起來的。

蕩陰敗後，司馬越回東海國，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

〔1〕 參閱《通鑑》永興元年十二月丁亥條。

淮，進行了大量的活動^{〔1〕}。從此，徐州地區成為他的廣闊後方。他部署諸弟司馬騰、司馬略、司馬模分守重鎮以為形援。然後他移檄征、鎮、州、郡，自為盟主，並於光熙元年（306）把惠帝從長安奪回洛陽。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相繼被害，繼立的晉懷帝完全在司馬越的掌握之中。司馬越在皇族中已沒有強勁的對手，八王之亂至此告終。勝利的司馬越贏得了瘡痍滿目的山河，也獨吞了八王之亂的全部惡果。匈奴劉淵、羯人石勒的軍隊動輒威脅洛陽，使司馬越不遑寧處。

司馬越並不具備皇室近屬的名分，號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聯絡關東的士族名士，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力量來支撐自己的統治。關東是士族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司馬越統治的命運。但是關東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樣，在十幾年的大亂中受到摧殘。有些人鑒於政局朝秦暮楚，盡量設法避禍自保。名士庾敳見王室多難，害怕終喪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宣揚榮辱同貫、存亡均齊思想。還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吳士張翰、顧榮辭官南歸，潁川庾袞率領宗族，聚保於禹山、林慮山。這種種情況，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動向。司馬越必須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夠影響的人物列於朝班之首，才能號召盡可能多的士族名士來支持他的統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馬越看中，他們密切合作，共同經營一個風雨飄搖的末代朝廷。

〔1〕《晉書》卷七一《孫惠傳》，記孫惠此時以書干謁司馬越，謂越「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隅之野（指在東海國和東方各地活動，並收兵下邳），西咨河間（河間王顥），南結征鎮（征南司馬模，督豫州；鎮南劉弘，督荊州，均黨於越），東命勁吳吳琰之富（揚州劉準），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幽州越黨王浚，并州越弟司馬騰），宣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馬略，徐州司馬模），啟示群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云云。這大體是其時司馬越勢力分佈圖。

王衍郡望雖非東海，但卻是東海的近鄰。王衍家族的社會地位，高於東海國的任何一個家族。王衍是其時的名士首領，以長於清談為世所宗。據說此人終日揮塵談玄，義理隨時變異，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服。《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清談家王衍的許多軼事。不過王衍的玄學造詣，聲大於實，史籍中除了記他祖述何晏、王弼「貴無」思想和反對裴頠的「崇有」之說等寥寥數語以外，不言他對玄學究竟有甚麼貢獻。清人嚴可均輯《全晉文》，竟找不到王衍談玄內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說：「嗚乎！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¹⁾從此，王衍就以清談誤國受到唾罵，至於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口頭上雖說「不以經國為務」，自稱「少不預事」，但青年時代就「好論縱橫之術」。以後除了一個短時間以外，王衍始終居於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為愍懷太子妃，一適賈充之孫賈謐。可見他在西晉末年宮廷傾軋這一大事中既結后黨，又結太子，兩邊觀望，期於不敗。王衍另一女為裴遐妻，而裴遐是東海王司馬越妃裴氏從兄。王衍通過裴遐，又同東海王越增加了一重關係。以上種種，都是王衍所結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動的需要。他被石勒俘獲，臨死猶為石勒「陳禍敗之由」，並且「勸勒稱尊號」。他戀權而又虛偽，服膺名教與自然「將無同」的信條。他和司馬越作為西晉末代權臣，除了操縱皇帝，剪除異己，羈縻方鎮，應付叛亂以外，沒有推行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

司馬越與王衍，是一種各有圖謀的政治結合。司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權勢；王衍則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當時北方名士團聚在王衍周圍的，數量很多，

(1) 《晉書》卷四三《王衍傳》。

其中的王敦、謝鯤、庾數、阮修，號為王衍「四友」^[1]。由於王衍的引薦，諸王、諸阮以及謝鯤、庾數、胡毋輔之、郭象、衛玠等名士都被司馬越所延攬，南士也有辟於司馬越府者，所以史稱越府「多名士，一時俊異。」^[2] 這些人祖尚玄虛，多半沒有政治能力，在司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夢死，等待着命運的安排。他們之中多數人陸續過江，庇託於江左政權；有些名士則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殺。

東海王越妃出河東裴氏。西晉時裴氏與王氏齊名，時人以兩家人物逐個相比，以八裴方於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馬越聯繫士族名士的又一橋樑。不過裴盾、裴邵沒有來得及過江。裴邵隨司馬越出項域，死於軍；裴盾後降匈奴，被殺。裴氏與司馬越個人關係雖密，但其家族不出於河南，與司馬越府掾屬多出於河南士族者，畢竟有所不同。這種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見，當淵源於昔日司馬穎居鄴、司馬越居洛陽而相互對立的歷史。裴氏家族重要人物與其他河北士族一樣，罕有過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沒有在東晉政權中取得相應的地位，以繼續發揮像王氏家族那樣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懷帝時的西晉朝廷，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實質上就是司馬越與王衍「共天下」。可以說，這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一種組合，一個形態。

在司馬越、王衍操縱之下，另一個王與馬相結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這就是晉琅邪王司馬睿與琅邪王導在徐州開啟的局面。

[1] 《晉書》卷四三《王澄傳》。《世說新語·品藻》「王大將軍下」條謂庾數、王衍、王澄、胡毋輔之為王敦四友。同條注引《八王故事》、《晉書》卷四九《胡毋輔之傳》又另有說，不備錄。

[2] 《世說新語·賞譽》。《晉書》卷五〇《庾數傳》謂「越府多俊異」。按越府僚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絕大部分為當時士族名士。

王氏家園所在的琅邪國，是司馬睿的封國。司馬睿的琅邪國與司馬越的東海國相鄰，都在徐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卬曾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晉書》卷三八本傳稱其「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後來，當司馬越收兵下邳，準備西迎惠帝時，起用琅邪王司馬睿為平東（後遷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為他看管後方。司馬睿受命後，請王衍從弟、參東海王越軍事的王導為司馬，委以重任。由司馬越、王衍在洛陽的關係，派生出司馬睿和王導在徐州下邳的關係，王導在司馬睿軍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馬越物色司馬睿，還有歷史淵源。司馬越與司馬穎對峙之時，司馬睿與其從父東安王司馬繇先居洛陽，後居鄴城。那時司馬越已通過辟於越府的王導對司馬睿施加影響。蕩陰戰後，司馬繇被司馬穎殺害，這更堅定了司馬睿在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之爭中投向東海王越一邊的決心。司馬睿在王導勸誘下南逃洛陽，轉回琅邪國，在那裏接受了司馬越的號令。從種種跡象看來，司馬睿、王導同蒞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組合，而是司馬越、王衍精心的策劃與安排。洛陽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下邳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都是日後建康「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

不過，情況還是有區別的。洛陽司馬越、王衍的組合，掌握實權的是司馬越；而徐州下邳司馬睿、王導的組合，王導卻起着主導作用。那時，司馬睿還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¹⁾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可以把司馬睿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王導傳》敘述這一段關係時說：「〔導〕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

(1) 《晉書》卷六《元帝紀》。

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透過這一段夾雜着攀附之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睿在北方所經歷的大事，幾乎全出王導的主動籌謀。王導在鄴城、洛陽、下邳，早已發現了司馬睿「奇貨可居」，很像當年呂不韋在邯鄲發現了秦國的子楚一樣。子楚曾約定分秦國與呂不韋共之，而司馬睿後來實際上與王導共享東晉天下。

永嘉政局，紛亂異常。劉淵等交侵於外，懷帝、司馬越構嫌於內，州郡征鎮叛服不常，流民暴動此伏彼起。司馬越、王衍力圖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控制，搶據要衝，以維持殘破局面。在這種形勢下，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受命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王導南渡建鄴。這是司馬睿、王導同鎮下邳兩年以後的事。其時，王衍為門戶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按指中原）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按指洛陽），足以為三窟矣。』」^[1]孫盛《晉陽秋》記此事，謂王衍辭諸弟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2]依孫盛所記，王衍經營「三窟」，並不是消極地效狡兔之求免於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時圖謀霸業。以後的事實表明，王衍追求的霸業沒有實現於齊楚，而實現於揚州的江南；不是假手於王澄等人，而是假手於王導。這

[1] 《晉書》卷四三《王衍傳》。《通鑑》繫此於永嘉元年十一月，後於司馬睿鎮建鄴二月。

[2] 《世說新語·簡傲》「王平子出為荊州」條注引《晉陽秋》。按此與《晉書》王衍、王敦等傳都說王敦出刺青州，《通鑑》亦同。而《世說新語·識鑑》「潘仲陽（滔）見王敦」條注引《漢晉春秋》、《通鑑》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條《考異》引《晉陽秋》，並謂其時王敦出刺揚州。

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為他設想的「三窟」均在長江以北，並未包括揚州江南部分。

從人物構成和歷史淵源說來，揚州一窟，同樣是司馬越、王衍勢力所派生出來的。揚州江南窟成，齊楚已亂，王馬天下，只有於此經營。但是此時洛陽尚有懷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勢暫時還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導在建鄴「潛懷翼戴之計」，待機脫離洛陽以稱霸江左的事實，謂其時江左「陰氣盛也」^[1]。這反映晉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時人的估計之中。

司馬睿渡江一舉，開啟了東晉南朝在江左立業局面。不過這不是司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馬越、王衍的全盤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馬睿、王導受命過江，從軍事、政治上說，是為了填補陳敏被消滅後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荊楚呼應，保障徐州，並為中原掎角。這一點與江左原來的政治形勢有關，將在本文下節詳論。從經濟上說，很可能有替堅守中原的司馬越、王衍搜括江南財富，特別是漕運江南糧食的目的。

原來，陳敏在洛，為尚書倉部令史，建議於執政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2]因此陳敏得以出為合肥、廣陵度支。他後來擊敗石冰，割據米穀豐裕的揚州江南諸郡，也得力於所統運兵。《水經·淮水注》謂陳敏於中瀆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以改變湖道紆遠狀況，縮短了江淮間的航程。此事內容尚有疑點，不可全信，亦非全

[1] 《晉書》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2] 《晉書》卷一〇〇《陳敏傳》。同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越致敏書：「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

誣^[1]。《太平御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志》，謂陳敏在丹陽境開練湖，而練湖之開與維持丹陽、京口間運河航道有密切關係。《輿地紀勝》卷七引《輿地志》，謂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為京口運河航道重要設施，據說「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按司馬裒鎮廣陵，開丁卯埭，為建武元年（317）事，在陳敏於揚州江南開練湖以濟運河之後十年。這些維修江南運河的史實，都與陳敏離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馬睿、王導在徐州時本有漕運任務。徐州治所下邳，當泗水通途。《水經·泗水注》：宿預，「晉元帝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2]。司馬睿與王導南來，沿中瀆水下廣陵，過江而達建鄴^[3]，也是踵陳敏之跡。根據這許多跡象，我推測，司馬睿、王導奉命南來，本有與陳敏相同的漕運江南糧穀以濟中州的經濟目的。

細察王衍「三窟」之說和其後事態發展，可以認為司馬睿、王導受司馬越、王衍之命南來，並不是為越、衍南逃預作準備。司馬越和王衍始終不見有南逃的打算。我們知道，司馬越是在逗留東海、收兵下邳以後才得以成為獨立力量的。他的軍隊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人為多。洛陽宮省宿衛，也都被司馬越換成東海國將軍何倫、王景的東海國兵。永嘉四年（310）冬司馬越聲稱為討伐石勒而離洛，還以何倫和堅決支持司馬越的「乞活」^[4]帥李憚等軍，奉東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衛洛陽，監視宮省。這些情況，說明司馬越、

[1] 參田餘慶《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文中「廣陵之役與中瀆水道問題」一節，《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

[2] 《初學記》卷八河南道「邸閣」引《西征記》：「宿預城下邳之中路舊邸閣」，當即指此。

[3] 《太平御覽》卷一七〇引《建康圖〔經〕》：「西晉亂，元帝自廣陵渡江」云云。

[4] 關於「乞活」來歷及其政治動向，參看周一良《乞活考——西晉東晉間流民史之一頁》一文，見其《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本文「不與劉、石通使」一節對此亦有所論述。

王衍勢力的地方色彩很濃。他們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慮偏安江左。其時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壽春，也被拒絕，周馥以此為司馬越、司馬睿的軍隊夾攻致死，這就是史臣所謂「祖宣（馥字）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1]一事。司馬越的戰略意圖，是依託徐州，守住洛陽，自為遊軍與石勒（以後還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馬越這一戰略意圖的。當洛陽由於劉淵、石勒的攻擊而人心浮動，遷都避難呼聲甚緊時，「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2]。後來，司馬越、王衍擁軍東行，越於道中病死而託後事於衍，衍必欲扶越柩歸葬東海，以至於在東行道中為石勒部眾追及，王公士庶十餘萬人俱死。何倫、李憚擁裴妃及世子毗逃離洛陽，世子和三十六王^[3]都落入石勒之手，何倫東走歸下邳，李憚北走廣宗^[4]，時在永嘉五年（311）。

司馬越、王衍擁眾東行，從戰略戰術上看不出有其他用意，只是反映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將士「狐死首丘」的願望而已。《晉書》卷三五《裴楷傳》載東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發良人為兵，司馬越死，裴盾「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也是東方將士只圖奔返家鄉之證。

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而無南渡意圖，客觀上便利了司馬睿、王導在江左獨立經營。東方青、兗、豫、徐諸州士族名士則多有

[1] 《晉書》卷六一《周馥傳》。參看同書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禍」條。周馥事涉統治階級中其他矛盾，但也表明司馬越、王衍無意南遷。

[2] 《晉書》卷四三《王衍傳》。

[3] 此據《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同書卷五《懷帝紀》、《魏書》卷九五《石勒傳》數各不同。

[4] 李憚及「乞活」部眾均并州人，故不東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廣宗，蓋欲附司馬越黨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憚為青州刺史。廣宗的上白，遂為「乞活」的一個重要據點。

在胡騎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馬越府俊異陸續歸於司馬睿府，成為司馬睿府「百六掾」的主幹，有助於司馬睿、王導勢力的壯大，而且也顯示出麇集江左的這一集團是洛陽朝廷事實上的繼承者。爾後，江左的門閥士族大體上都是出於昔日司馬越府的僚屬。

與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成為對照的，是閭鼎的西行。閭鼎，天水人^[1]，也出於東海王越府參軍。他鳩集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洛陽淪陷後，他翼戴秦王（後來的晉愍帝）西奔長安。裹脅而行的以荀藩、荀組為首的行台諸人多關東人，不願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殺。由此可見，其時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還有關東、關西的畛域之分，這在士族人物中確實是一個重大問題，影響着政局的發展。

西晉統治者進行的八王之亂以及隨後出現的永嘉之亂，既摧殘了在北方的西晉政權，也毀滅了幾乎全部西晉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隨他們的士族人物。吳人孫惠在上司馬越書中說：「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2]王衍一夥慘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屍骸。他們在北方徹底失敗了。殘存的長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維持多久。只有他們派出的司馬睿和王導，在建鄴植下了根基。由於皇族劫餘無多，建鄴的司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號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導。這樣，在北方具有雛

[1] 《晉書》卷六〇《閭鼎傳》。閭鼎實際上是巴西安漢人，吳仕鑒《晉書斟注》據《新唐書》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存的晉武帝的後裔，名分居先。儘管他操縱在西人之手，只要他尚在，建康的司馬睿就不敢稱帝。所以建興四年愍帝被俘，五年司馬睿只稱晉王；是年冬愍帝死，翌年司馬睿始稱帝。

[2] 《晉書》卷七一《孫惠傳》。

形的「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為一個新朝政權的基本結構。

三 司馬睿與王導 門閥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西晉滅亡以後，江左的東晉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

關於南渡，據知有如下三種記載。

《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元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和)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於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興之功」，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當時還受制於司馬越與王衍，不可能獨自做出這件大事的決斷。司馬睿於越、衍，關係尚淺，也不可能決定南渡大計。所以，司馬睿「用王導計」始渡江之說似嫌簡單，不盡符合當時的情況。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見前述。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時，司馬睿為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馬睿安東府長史，與安東府司馬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¹⁾。所

(1) 《晉書》卷三五《裴楷傳》。《三國志·魏志·裴潛傳》注引《晉諸公贊》載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這些都說明司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關係。王曠書當係曠棄丹陽居下邳時作。

以裴妃對於司馬睿、王導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關切，說她表示過這種意願，是完全合理的。後來，東海王世子毗陷於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賣，東晉既建，始得過江。司馬睿為報答司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後為東海王世子，以毗陵郡為其封國，又以毗陵犯世子諱，改名晉陵。這些都說明裴妃對於南渡是起過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說成只是裴妃個人的意願促成，也不妥當。

《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羲之……父曠（一作廣），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按王曠為淮南之前居丹陽太守職。《晉書》卷一〇〇《陳敏傳》謂敏起事後，「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曠）等皆棄官奔走」。王曠與劉機曾經同治秣陵，他們商議軍情的文書，今天還保存了一些片斷^[1]。關於王曠倡議渡江之事，東晉人裴啟所撰《語林》說：「大將軍（敦）、丞相（導）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弘（曠字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別壁窺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2]按《語林》成書於哀帝隆和時，多載人士語言應對之可稱者，「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謝安的不實之詞，為謝安所糾^[3]。所記王曠建策一事，當時王氏子孫具在，未聞異詞，應當基本可信。王曠建策，時間當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陳敏敗亡至司馬睿初受都督揚州江南之命之間，地點估計是在下邳。

[1] 《太平御覽》卷三三七王曠《與揚州論討陳敏計》。

[2] 《太平御覽》卷一八四引。

[3] 《世說新語》文學、輕詆等篇及注引《裴氏家傳》、《續晉陽秋》。

以上三說⁽¹⁾，各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覆謀劃。概括言之，南渡之舉王氏兄弟曾策劃於密室，其中王曠倡其議，王敦助其謀，王導以參東海王越軍事，為琅邪王司馬睿的關鍵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內大力贊助；最後決策當出自司馬越與王衍二人，特別是司馬越。《太平御覽》卷一七〇引顧野王《輿地志》：「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按指毗陵）為晉陵。」按表遣雖然只是一種形式，但不經司馬越上表這一形式，司馬睿、王導就無從被派遣過江，過江後亦無法統憑據。至於司馬睿本人，如《晉書》卷五九《八王傳·序》所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問題上只能是被動從命，無決斷權。

過江以後，司馬睿也並不是江左政局草創中不可須臾離的人物。尊經閣本《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條汪藻《考異》⁽²⁾：司馬睿過江兩個月後，「十一月，太妃薨為（於？）本國琅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³⁾。這一詳細的時間表，說明司馬睿甫過江，即操持奔喪之事，並不因南遷始爾而抽身不得，循請奪情。這是由於坐鎮江東，穩定局勢，主要不是靠司馬睿，而是靠王導。有王導在，

(1) 三說之外另有一說。《南齊書》卷五二《文學·丘靈鞠傳》靈鞠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僧渡，妨我輩途轍，死有餘罪。」這是丘靈鞠自以仕途不順的憤懣之詞，並非敘事，可不置論。

(2) 本書所用《世說新語》汪藻「敘錄」、「考異」、「人名譜」等資料，均據王先謙《世說新語》校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所附該書尊經閣本（日本珂羅版影宋本）。

(3) 《晉書》卷六《元帝紀》記此事甚略，只說「屬太妃薨於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

有王導輔翼晉琅邪王司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這正是南渡後「王與馬共天下」的具體反映。「王與馬共天下」並不像《晉書》卷九九《王敦傳》所說那樣，只是司馬睿過江後王敦、王導一時「同心翼戴」的結果。可以說，過江以前已經具備了「共天下」的許多條件，過江以後始得有天下而共之。

能夠實現南遷，還由於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土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

原來，西晉滅吳後，江東被認為是多事的地方，所謂「吳人輕銳，易動難安」^[1]。西晉以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吳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晉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於吳之議，時劉頌為淮南相，認為此議「未盡善」，主張以「壯王」、「長王」出鎮^[2]。八王之亂前夕，吳王晏始受封，但是並未之國。六州將士更守江表之制當亦難於繼續維持。江東既無強藩，又乏重兵，羈縻鎮壓，兩皆落空。

八王之亂後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陽政權已難維持，亟須一個像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家族的利益。他們在江東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陳敏。他們起先擁護陳敏，為敏所用。司馬越在下邳收兵，也聯絡陳敏，想藉助他以消滅自己在北方的對手。但是陳敏過江後既排斥江東士族，企圖獨霸江東；又自加九錫，聲稱自江入沔漢^[3]，奉迎鑾殿，以與司馬越爭雄。

[1] 《晉書》卷五二《華譚傳》晉武帝策問華譚語。

[2] 《晉書》卷四六《劉頌傳》。

[3] 自江入沔漢，據《晉書》卷四《惠帝紀》永興二年（305）十二月條，《通鑑》同。《晉書》卷一〇〇《陳敏傳》作自江入河，誤。因為當時惠帝在長安，陳敏循沔漢可以與長安聯繫，而不必通過大亂的黃河流域。